



第十章

动员妇女，重塑民主

公民社会的妇女活动是推动立法向着有利于妇女的方向实现变革的主要动力，为担任公职的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积极、自发的妇女运动可以极大地增强妇女团体的影响力，可以“在政府内部对于颁布和实施女权政策表示抵制的情况下，提供一个与之抗衡的外部支持和法律基础。”¹ 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的政治家应该从国内妇女运动中得到启示。假如各种妇女运动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的纲领团结起来，假如政党能够更加积极地应对妇女的需求，政治家开展工作将会容易得多。然而，除性别问题之外，全世界妇女还关注着其他很多重要问题，有人会因此提出，性别问题属于国家或文化规范范畴，而很多文化中的性别关系本身就是极为不平等的。

人们通常认为，妇女的政治影响力低，是由于女性在时间和金钱等方面的资源有限，而这些资源正是产生社会和政治影响所必需的；另一个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分歧造成女性的利益差异。² 然而，世界各地都有妇女积极投身于公民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通讯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妇女可以采用新的方式敦促政府、社团和国际组织等主要行为者承担责任。关于贸易、卫生和人权等各种主题的全球首脑会议和大会使得妇女能够建立起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网络系统，为各国及国际妇女运动争取到合法地位，让妇女成为全球政策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在分析妇女运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之前，首先需要了解这些运动的特点。一个实用的普通

定义是，妇女运动“是妇女为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³ 集体行动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协会，也可以是由志同道合的组织和参与运动的非正式团体构成的广泛联盟。这个定义没有强调妇女运动一定要以重新调整性别权力关系作为核心目标；但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应该是妇女，其作用应该是动员广大妇女。由女性来主导妇女运动，这表明妇女运动的基础是性别认同：正是由于她们的女性身份，这些妇女才积极行动起来，才会明确地主张女性身份认同。⁴

妇女运动和女权政治

妇女运动不一定是女权主义。女权政治明确反对男权统治，要求消除因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造成的从属地位和歧视现象。⁵ 因此，妇女运动中的女权团体可能会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而这可能是最初的组织基础。⁶ 对于这两类运动不能相提并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女性集体行动必然致力于推动妇女权益和实现性别公正。事实上，某些右翼妇女运动和保守派宗教妇女运动的目标正好与之背道而驰。

除妇女领导的各种组织之外，其他社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旨在动员妇女和团结妇女。工会、政党、国家支持的群众组织、以及奉行不同纲领的公民社会团体同样可能为自己的女性成员主张权利。动员妇女的这些形式是团结全球女性的重要力量，甚至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力量。⁷ 假如妇女动员工作不是自发或不是独立的，就可能会

采取“协会结盟”的形式，同其他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在世界各地，妇女团体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缔结了战略联盟，后者有时是实力更为强大的组织，主要致力于环境、和平、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和人权等领域。⁸

此外，妇女动员的工作还可以采用“有指导的动员”的形式，由另一个权威机构对其进行控制，通常是政府或政党。以集体、国家或宗教的名义，在权威机构的指导下开展的妇女动员活动，不仅不会将妇女解放作为核心目标，而且还有可能在实际上取消妇女已经获得的权利，某些宗教运动就属于这种情况。⁹保守派领导人一直积极鼓励妇女参与这类形式的集体行动，目的是以男权姿态解读妇女的权利，并为强化这种解读方式的提议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找到法律依据。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79年伊朗妇女参与伊斯兰革命。

妇女参与民主化运动

1989至1990年间，随着东欧集团的国家社会主义垮台以及这些国家向着开放经济转型，民主化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达到了高峰。¹⁰近15年来，民主化运动在残余的集权主义国家继续蓬勃开展，继巴尔干冲突和非洲冲突结束之后，新的民主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放眼全球，有很多国家正在广泛推进巩固民主的进程，这些国家正在修改法律制度，增设新的宪法权利，其政治制度对于反对派的容忍程度也正在经受考验。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和政治自由化浪潮要早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妇女以最为激进的方式推动宪法及立法改革，争取法律承认女性的平等地位，并通过政策来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

妇女在很多民主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是民主化斗争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已经

得到了认可。在政治反对派的常规活动渠道被关闭的情况下，妇女的作用尤其重要。假如政党和工会被禁，比如奥格斯托·皮诺切特总统统治下的智利，假如民族解放运动的男性领导人遭到流放或监禁，比如南非的情况，基层妇女的动员工作可以为政治反对派搭建起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舞台。对于民主化运动的这种贡献并不总能为妇女今后参政提供一张跳板。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智利贫民抗议运动期间，分散的组织和松散的领导结构为女性积极分子提供了保护，但没有产生能够在新民主党派中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政治家。

妇女参与民主化进程的模式有迹可循，其中有些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同背景下彼此类似，另一些模式则具有区域特点。在长期存在社会不满情绪和抵制运动的情况下，妇女不仅活跃在社会动荡的峰口浪尖，而且妇女代表能够参与新宪法的磋商过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非全国妇女联盟对于宪法起草工作所做的贡献，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妇女运动可以利用自己以往的作用在新的环境中争取权益。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东帝汶、菲律宾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进程。

强烈抵制：东欧的经验

前苏联和东欧的集权主义国家在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方面对妇女抱有包容态度，并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部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日后的民主化运动对于妇女参政表示出强烈的抵制。在东欧，压制民意的共产党政权在公共事务中给妇女分配的角色旨在鼓励妇女淡化女权利益，强调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保护家庭隐私和维护家庭完整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者

开展运动，抗议侵略性的社会工程，此项运动被视为“反政治”意识形态。¹¹ 在这些运动当中，妇女并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位；在“77 宪章”的签署者当中，女性仅占 20%。波兰团结工会有半数成员都是妇女，但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却寥寥无几。¹²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以及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大幅度减少，妇女对于公民社会活动的参与也随之陷入停滞状态。很多东欧国家的女权团体如今已经非常薄弱，¹³ 即使是在活跃着多个女权团体的波兰等国，女权运动也往往被描述为“奇闻轶事，而非真正的政治力量”。¹⁴ 有些妇女组织推崇保守观念，认为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是女性的理想角色，同时强烈反对堕胎和生殖权利。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最受女性选民的青睐，女性党员的比例也最高，而该党宣扬的是妇女高尚的道德以及她们在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责任。

悖论：北非和中东

在一些北非和中东国家，民主化运动带来了同样的悖论。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等国，军政府、一党专政或君主政体压制伊斯兰协会，政府往往以社会发展项目来替代民主，并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此外，政府还会采取措施来提高妇女的地位。¹⁵ 促进妇女权利的事业就这样同不得人心的政府挂上了钩。自上而下的政治自由化进程发展迅猛，但不完整，旧政府中的官吏极少有离职者。限制有效的政治竞争显然属于背信弃义之举，政治改革进程也因此信誉扫地。

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惟有伊斯兰团体一贯明确反对现政权，并且得到了民众的信

任。这些团体的思想基础是强烈反对西方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妇女运动则完全陷入了两难困境。在当前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以及伊拉克冲突当中，世俗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削弱，伊斯兰反对派赢得了更多妇女的信赖。妇女运动没有充足的社会和政治资本能够同强大的伊斯兰组织进行抗衡，她们宁愿同伊斯兰组织结成战略联盟。在很多人看来，这样做可以进入伊斯兰阵营内部开展工作，设法修改关于妇女角色的宗教阐释，扩大妇女的政治表达空间。¹⁶

强加于人的民主化：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治自由化进程是在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并以此作为换取外部贷款的条件。因此，各国对待政治自由化进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妇女的参与也非常有限。在马里、科特迪瓦、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和马拉维等国，历来习惯于独掌大权的执政党试图控制民主化运动，遏制有实力的反对派。传统的“大男人”政治往往会限制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哪怕这些活动微不足道，而且一心一意支持国家领导人。政治自由化进程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时的妇女运动非常薄弱，无法参与政治进程。

例如，坦桑尼亚执政党在 1995 年宣布恢复多党政治，30 年来第一次举行全民投票，但人们没有机会反思过去，也没有机会就民主政治规则进行重新磋商。1994 年初，马拉维的公民社会只能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九十年代中期，赞比亚的社会剧变和激烈动荡致使 1996 年多党政治选举在匆忙中完成，同样没有机会修改宪法和改变体制。与此相反的是，乌干达在内战结束之后经历了漫长的过渡期，这使妇女

能够积极参与宪法讨论，但这是在受宪法保护的一党专政框架内进行的。

同北非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结构或领导层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说明巩固民主的工作进展缓慢。加纳、贝宁、塞内加尔和肯尼亚不在此列，这些国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有些国家，反对党仍然弱小，执政党的力量极其强大。这就使得妇女运动面临严峻问题，因为制订性别敏感政策有赖于国家的支持。于是，我们所熟悉的悖论再次出现：执政者支持妇女运动，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争取性别平等的事业却因此失信于民众。安哥拉、布隆迪、刚果、索马里、苏丹和利比里亚等国，民主化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期盼，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正在努力制止恐怖和战争，或是正在努力摆脱恐怖和战争的阴影。津巴布韦就是一个例子，在国家的残酷镇压之下，民主进程已经失去了基础。2000年选举前夕，整个政坛的妇女政治动员活动在弥漫各地的威胁恐吓面前戛然而止。

妇女努力推动宪法改革

近年来，宪法改革是妇女参与民主化的核心目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妇女组织纷纷站出来揭露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局限性，婚姻和家庭生活等“私人”领域被排除在民主审查之外。宪法审议工作让女性政治家发现了妇女基本公民权利方面的严重漏洞，解决习惯/宗教法在管辖家庭事务方面的性别偏见问题。她们还制订了在国家及地方政府中实施配额或预留席位等相关规定，以便于妇女今后担任公职。¹⁷

在宪法审议工作中坚决维护妇女权利的立场至关重要，正是这种重要性在宪法审议过程中将各种妇女运动组织紧紧团结在一起，哪怕只是暂

时的。在乌干达，妇女参与了立宪会议，为妇女在本届立宪会议以及有多名妇女当选的第一届国民议会上有效地组成核心小组奠定了基础。参政增强了女政治家的从政能力，那些支持和游说女性官员的妇女团体则通过参政拓展了自己的政治技能，加深了对政治的理解。参与制宪工作，是争取政府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履行公共问责制的新的斗争领域。坚持参与民族成员资格、参政、从政的规范制定工作，各界妇女正在表明，她们不会听命于自己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表权的政治机构。

动员妇女争取选举权益：

争取男女比例各半

在后转型期，很多国家的妇女运动趋于平淡。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支持民主运动的著名女权主义活动家纷纷进入政府。在很多地方，为共同反对专制主义而组织起来的联盟已经解散，长期存在的差异重新浮出水面。然而，无论妇女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有多么严重，始终存在着一个绝大多数妇女都认同的共同立场：要求在公职方面实现性别平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要求男女享有同等代表权的公民社会运动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为争取男女比例各半而发起的国际运动为此提供了帮助。妇女从政人数少，政党对妇女所关注的问题漠不关心，政界上上下下的妇女无不对此深感不满。

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增加，可以吸引更多的妇女加入进来。例如，随着乌干达从政妇女人数的增多，出现了更多的“乌干达妇女的新型政治自我组织”，¹⁸争取政治权利已经成为各种妇女团体的共同利益所在。在纳米比亚，各种妇女组织因种族不同而分歧严重，但她们为了一个共同目

标而团结起来：推动妇女当选公职。1999年成立的“纳米比亚妇女宣言网络”是支持妇女竞选宣言的组织联盟，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政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妇女配额达到50%，而且，候选人名单应采用“斑马”式结构，男女候选人的名字交叉排列。这项“男女比例50/50”运动在纳米比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总动员，“政治正成为（非洲）新兴女权主义舆论的核心”，以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妇女政治代表权学说正在塑造未来的非洲妇女运动”。¹⁹

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增加正规政治机构中的女性代表人数，已经成为将这一地区的各类妇女团体团结起来的一个主题。很多国家通过了相关法令，要求政党候选人名单实施妇女配额制，但仍有很多政党试图规避政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监督政党是否遵守相关规范，是各类妇女政治团体共同关注的问题，保守党妇女和左翼党派同样关注政治议席。

但是，关于平等权利行动措施的各种倡议并不总能将妇女联合起来。在印度，在议会中为妇女保留33%席位的宪法修正案从1996年被搁置至今。尽管这项修订案得到众多妇女协会的支持，但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中，这并不是各界妇女共同关注的议题。其中的原因触及印度政治的痛处。印度民主运动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印度各邦都出现了众多小规模族裔政党和种姓政党，这些政党对于中央政府能否成功缔结联盟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²⁰ 这些族裔政党和种姓政党的兴起，是数十年来推行平等权利行动的成果，这些行动在中小学、大学和公共部门就业中划出专用名额，用以支持社会弱势部落和种姓。要求为妇女保留33%议席的宪法修正案遭到一些

族裔及种姓政党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试图巩固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上等种姓在国家政治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关于保留席位的议案没有规定“配额以内的配额”，目的是为了确保进入议会的妇女不是那些受过教育、家境富裕、而且最有可能具备竞选公职所需的各种关系和资源的上等种姓的妇女。²¹

妇女对于宗教运动和族裔运动的反应

在很多国家，政治自由化运动使得非宗教妇女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却已经停滞，或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的泥潭。假如国家在现代化和非宗教的旗帜下不能提供实际的安全保障，不能改进服务，那么国家的形象就会遭到破坏。在某些国家，人们不再相信现代化是消除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尽管遭到政府的打压，但各种保守的族裔运动和宗教运动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对于很多团体而言，性别关系是首要问题，特别是当“妇女解放”同失败的或镇压性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此类团体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他们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边缘群体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在北非和中东国家（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约旦）、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例如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西非国家（例如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伊斯兰组织不太可能在议会中赢得大量席位。但是，作为中间人和实权派，这些组织在执政联盟中握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菲律宾和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组织是被禁止的，但他们的干预能力正在逐渐增强。此外，世界各地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基督教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例如在拉丁美

洲和非洲发起基层自助活动的社会促进组织。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以及菲律宾，教会依然能够对高层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印度教沙文主义文化及宗教运动使得印度教选民和穆斯林选民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并为其支持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没有证据表明，保守的宗教或文化极端主义团体对于女性的吸引力更大一些。然而，世界各地都有迹象表明，此类组织的实力正在不断加强。妇女作为成员和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还不够明确，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类团体所推崇的文化复兴或完美社会往往以妇女在家庭当中的行为举止、活动范围、衣着和角色作为核心内容。妇女举止被视为是为人真诚和道德高尚的标志。结成政党的保守派宗教团体无论是在政党内部，还是在公职方面，都不允许妇女接近机构权力。但是作为社会活动，他们鼓励妇女参加公众活动，甚至鼓励妇女冲破传统性别角色，成为一名斗士。例如，2002年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屠杀穆斯林暴行期间，印度教民族主义妇女借机煽动暴乱。与此同时，这些妇女明确提出了限制妇女权利的文化和社会纲领。族裔或宗教团体在动员妇女的同时压制妇女的进步，女权主义者对此极为关注。穆斯林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者所采用的非宗教方法可能会疏远大多数虔诚的女性信众，随着伊斯兰政治派别的发展壮大，这些女权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非宗教方法。

反自由运动中的妇女

保守或极端宗教运动吸引妇女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来解释。宗教集会为妇女提供了一个被社会所接受的舞台，妇女可以在此表达自己的心声。很多宗教或教派运动提供妇女所需的多项服务，同思想进步、但无法切实实施的非宗教宪法规定

相比，这些宗教或教派组织可以更加可信和实际方式来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宗教运动为社会认可、性安全、规范性肯定以及政治机构提供了论坛，此外，身为丈夫者对于宗教运动的抵制也要小于他们对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感。

在保守社会中，妇女可以通过宗教运动担任社会领导角色。假如自食其力的妇女可能会遭遇性骚扰，且女性担任政治要职的正常途径少之又少，妇女则更有可能借助宗教运动争取社会领导职位。印度“国民妇女服务协会”是激进的印度教文化协会“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女性分支机构。当年轻女性能够以实际行动、社会工作、或者参加步枪及木棒使用训练等方式为印度民族主义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国民妇女服务协会”甚至可以帮助她们想方设法推迟婚姻。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为自己的女性成员提供特制罩袍，以标明其协会会员的身份，免于党派激进分子的攻击。这种做法为女性成员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宗教运动拥有大量资源，可以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伊斯兰组织还为儿童开办古兰经学校。在拉丁美洲国家的低收入社区，基督教教会组织建立了赈济处、学校和基本卫生服务机构。假如国家提供的服务设施极少，对于处在家庭和社区保障网络之外的妇女来说，慈善事业是她们获得救济的唯一途径。在孟加拉国，假如丈夫要求离婚，妻子既没有财产，也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她们唯一的出路是向伊斯兰促进会下属的农村妇女团体寻求庇护和经济支援。在国家安全系统失灵的情况下，宗教团体还可以发挥警戒作用。

当代宗教运动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由于这些运动敢于对国家、社会和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侵略提出批评，此外还由于这些宗教运动提高

了妇女的实际权利。在拉丁美洲各国，天主教教会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盟友，开始致力于支持穷人反对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斗争。在巴西、智利和萨尔瓦多，教会抗议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并为此同军政府发生了冲突；在巴西，教会的抗议活动使得女权主义者和教会在某些问题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运动公开批评政府的腐败和西方颓废文化的入侵，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些运动希望倡导一种真诚的文化观念，提倡男女社会作用互补。在经济改革削弱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能力，而女性在低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这种文化自然会具有吸引力。

宗教运动对于政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深得人心，而另一方面，宗教运动能够将保守的性别关系观点同妇女担任重要领导职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一些宗教组织甚至为妇女争取权利和能力提供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最成功的演说家是女性，其中不乏未婚女性，这与保守的女性行为规范背道而驰。1992年12月，在唆使暴徒捣毁阿约提亚清真寺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两位女性演说家——乌马·巴拉蒂和沙德维·里萨姆巴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们怂恿民众开展反穆斯林暴力活动的录音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被政府查禁。这类激进好战的妇女领袖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她们却主张妇女应该操持家务，服从丈夫。²²然而，从事宗教或民族主义活动要比履行传统职责更加重要，她们诱使妇女放弃谦让诚实的品性，从事武装活动，甚至执行自杀任务。

进步的社会立场

很多宗教团体强烈反对一夫多妻制和针对妇

女的暴行。此外，他们还支持妇女享有继承权，反对对妇女进行商业性剥削。相对于世俗党派而言，宗教运动更为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行为。为此，某些宗教运动竭力让妇女参与有关活动，满足妇女的需求。巴西工人阶层当中的五旬节教派团体特别重视帮助妇女解决家庭暴力问题。²³在孟加拉国，城乡妇女围绕生计问题和妇女权利所进行的动员活动十分突出，伊斯兰促进会明确指出，妇女的支持对其选举获胜以及社会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伊斯兰促进会在选举宣言中承诺提高妇女（独立的）就业机会，取消嫁妆，禁止对妇女施暴，支持妇女享有继承权，利用伊斯兰教义中关于人类平等的训诫，为自己树立进步的社会形象。

在有些国家，妇女提出了伊斯兰教的女权主义观点，并对只能由僧侣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做法产生了质疑，她们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将宗教运动的纲领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举措还表明，妇女希望在解释妇女权利的问题上增强一致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名义上的非宗教国家，对宗教法律的运用往往是随意的和前后矛盾的，目的是推翻宪法赋予妇女的权利。在伊朗，专制主义神权国家利用对伊斯兰教的刻板解释来限制妇女的权利，除了遵守伊斯兰教法的清规戒律，为扩大妇女权利提供新的解释之外，女权主义者能够合法从事其他活动的情况极少。²⁴

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伊斯兰神学家所进行的工作表明，伊斯兰教法能够满足妇女在婚姻、离婚和继承方面的诸多需求。支持女权思想的伊斯兰教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妇女得以深入了解自己在伊斯兰教法下的相关权利。但是，假如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伊斯兰教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当代神权国家典范，整个事业不会取得目前的进展。此外，当代伊斯兰女权主义是针

对伊斯兰固定文化模式的一种反应。²⁵ 由于伊斯兰教可以掌管国家，也由于当代社会对于穆斯林信仰及其信徒的诽谤诋毁，支持女权思想的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妇女的一个可靠选择。

非宗教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同宗教团体的妇女进行接触，因为她们意识到，后者确实关注着政治开放，而且也确实有机会对性别不平等提出挑战。例如在马来西亚，代表伊斯兰福利团体的穆斯林妇女加入了“妇女推动变革议程”，这个组织是在 1998 年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迫害安瓦尔·易卜拉欣副总理的企图失败之后成立的。

“妇女推动变革议程”由 80 余个非政府组织构成，主要目的是在这个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集权国家提倡民主改革。马来西亚女权主义者严厉批评国家的高压政策，但可供她们开展政治活动的实际舞台却非常有限。伊斯兰党派在政府压制民意的现代性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政府和伊斯兰反对派都认识到团结妇女的重要性，极力争取妇女的参与和支持。2001 年，政府设立了妇女事务部，尽一切可能拉拢“妇女推动变革议程”中的妇女活动分子，并讥笑伊斯兰反对派回避讨论性别平等问题。2004 年选举前夕，伊斯兰反对派发动反击，支持女权主义立场，宣布在每个州提出一名女性候选人。

跨国妇女运动

近一个世纪以来，跨国妇女运动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显著成就包括：反对战争；制订妇女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列入政治议程。²⁶ 近 10 年来，跨国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召开了多次联合国会议和世界首脑会议，各界围绕贸易、环境规范、反人

道主义罪行以及对妇女至关重要的其他问题展开了多轮国际谈判，这些活动激励广大妇女寻求结盟，并帮助妇女运动在与全球机构进行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日益普及协助妇女克服了她们在活动范围和发言权方面所固有的不利条件。全球公民社会近年来展示出的传播能力和机构实力将增强活动成效，对国家和国际政策产生国内妇女运动难以企及的影响。

当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妇女运动，也不存在全球女权主义运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妇女团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重大差异。不过，在生育权利、²⁷ 暴力侵犯妇女问题和国际刑法等问题上，妇女组织联盟对于全球规范的制订与决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争取经济公正的妇女运动同结构松散的“全球正义和团结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全球正义和团结运动”重点关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2001 年以来，这项运动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社会论坛作为自己的活动基础。²⁸ 2003 年 2 月 15 日，共有 1 100 万人参加了在 800 个城市举行的反战示威游行。妇女和平团体作为一支核心力量，参与这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2000 年，国际刑事法院在罗马起草并通过了规约，男女平等待遇问题妇女核心小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2003 年 3 月，这个小组协助 7 名女法官（共有 18 名法官）顺利进入国际刑事法院。

跨国妇女运动的成效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国际公民社会的游说团体要求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遵守国际规范和国际条约，但这些团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跨国妇女运动将目标锁定为联合国的各种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联合要求这些机构更加积极地应对公民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代表就决策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此外，

跨国妇女运动还利用各种会议之机开展联合行动，确定跨国立场。但是，国际条约和决议不一定能够在国内付诸实施，在极其保守和反对女权主义纲领的国家尤其如此。国际会议达成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极少触及社会深层结构问题。假如国家发生变革，就需要朝野妇女共同采取行动，敦促国家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²⁹

到底是在国家一级开展活动，还是在国际一级开始活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女权主义者和各界妇女同国际机构进行接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增强国家对于女性公民所承担的责任。例如，近年来出现的某些“反全球化”运动旨在加强国家在面对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时的独立决策能力。人们当前指责一些国际机构实施的方案加深了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不公正，妇女网络是否应该将这些国际机构视为自己纲领的拥戴者和实施者呢？假如妇女联合起来削弱这些国际机构的重要地位，她们对于国家议程施加影响、为妇女争取平等机会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在反对妇女权利的国家中，为国内妇女运动提供支持的希望也同样渺茫。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鼓动跨国妇女团体呼吁提高多边机构的能力，假如没有这些机构的支持，跨国妇女运动的努力也不会如此卓有成效。

跨国妇女运动本身也存在矛盾，这是由于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各方对于问题的界定、问题的优先次序、目的与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有些分歧属于传统差异，例如南北差异；另一些分歧则源自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并没有特别的地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分歧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跨国妇女运动所缔结的联盟几乎无一例外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同团

体之间的纲领缺乏共通之处。例如，旨在取消债务的国际运动“禧年 2000”缔结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天主教会，而教会当前奉行的等级制度恰恰同性别公正的目标背道而驰。³⁰ 权利体制、国际规范和条约义务所提供的庇护并不总能将所有观点统一起来。

以人权作为统一框架

人权概念主张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人类平等、关于公平和公正的普遍标准、关于个人和群体的自由观念、以及体恤民情的民主国家。不同文化对于这一概念的应用情况或许存在着争议，但人权框架提供了一张保护伞，过去 15 年来，各种妇女运动正是在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下团结协作。此外，明确提出妇女人权有助于将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问题纳入其他全球政策领域的核心，这其中包括社会发展、人道主义法律、人口和环境保护。

涉及妇女权利的主要国际文书是 1979 年制订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由于妇女运动的不断高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国批准条约的进展速度明显加快，此前曾对公约提出保留意见的很多国家纷纷撤销了保留意见。³¹ 1999 年《任择议定书》承认妇女组织是监督各国遵守《公约》情况的可靠机构，具有合法性；《任择议定书》还授权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受理由妇女个人或团体直接提出的申诉。（该委员会由 23 名独立专家组成，负责监督《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在国家一级的执行情况。）目前已经有 75 个国家签署了《任择议定书》，但还有很多国家尚未全面批准这份文件。《任择议定书》是否有助于各国遵守《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假如妇

女已经用尽了国内法律手段，或者认为“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的补救”，她可以根据《任择议定书》的规定直接寻求补救措施。《任择议定书》承认，存在于体制当中的男性偏见往往禁止报告妇女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形，从而影响国家报告制度，必须设立相关机制，以避免这种问题。³²

国际刑事法院

围绕《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开展的动员工作以及公约的实施机制促成了一家特殊的妇女运动机构的诞生，该机构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男女平等待遇问题妇女核心小组于1997年建立，其前身是有关各方为敦促国际社会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而在1995年成立的非政府联盟，并吸取了早期国际活动的优势和经验。该核心小组建议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机关任命妇女和性别问题专家，并力劝国际刑事法院独立于传统的权力机构之外。³³此外，核心小组还要求加强对于犯罪受害者的保护工作，敦促尽快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15条。这将使得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不仅有权调查安理会或各国提交给刑事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并且有权依据受害人、非政府组织以及“任何可靠来源”所提供的信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³⁴

男女平等待遇问题妇女核心小组还要求将性暴力定性为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如此一来，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所有国家均有义务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相关罪行进行调查和起诉，不得以国家主权为借口来掩盖国内暴行，无论此类罪行的犯罪者是谁，犯罪地点在哪里。负责处理性暴力问题的国家机构现在要对国际社会负责，而不只对本国公民负责。核心小组坚持妇女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确保将性暴力定性为

重罪，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手段，敦促各国对妇女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妇女人权受到普遍侵害的情况下，防止并检举相关犯罪行为。

关于性工作和贩运人口问题的意见分歧

一旦涉及到性贸易中的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即便是人权框架也无法克服各方的意见分歧。2000年12月，80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在意大利巴勒莫提出的《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国际人权网和人权核心小组这两大跨国游说集团围绕贩运人口和性工作的定义以及有关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不同意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各持己见，分歧严重。两个团体都以拥护女权主义和“人权”自我标榜，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双方都强调各自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网络建设。

国际人权网的核心组织是一家非政府组织——反对贩运妇女联盟。该联盟主张“废除”性工作，并认为卖淫是一种性暴力，性工作侵犯人权，假如妇女能够自由选择，她们是不会从事皮肉生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从事性工作为目的帮助妇女移徙者均属人口贩子。³⁵与之持相反意见的是反对贩卖妇女全球联盟、亚洲妇女人权理事会以及其他一些性工作者权利团体和人权团体。这些组织的核心观点同全球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想法不谋而合，都认为性工作是一种劳动，是妇女自主选择的一种就业形式，是妇女性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根据这种观点，以卖淫为目的强迫妇女移徙，或是强迫妇女从事性工作，均属于贩卖行为。处理相关问题的政策必须尊重妇女的主观意志，确定妇女是否事先同意从事性工作和移徙。

关于妇女的主观意志、性行为、同意、以及国家“保护”妇女措施的强制效应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性工作者游说团的一名成员指出，打击贩运行为的各项措施一直以来都被用来针对性工作者，而不是“贩运者”。³⁶ 性工作者团体认为，应将强迫或欺骗作为定义贩运的必要条件；此外，《议定书》不应将“贩运”和“卖淫”联系起来，因为被贩运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可能会从事多种不同的服务活动，其中包括血汗工厂劳动和农业劳动。但是，有关贩运问题的联合国议定书最终还是没有区别对待以性工作为目的的胁迫移民或自由移民，受害者不必证明自己是否遭到胁迫，总之是侵犯了人权。³⁷ 性工作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当代社会对于移民、寻求庇护、女性独立性等问题的心存焦虑，而且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应该隶属于家庭（见第七章）。

“人权”缺乏全面性的其他例证

涉及到妇女主观意志和性行为的其他类似问题使得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性恋，对于自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两性人者进行虐待。³⁸ 土著人民运动对于西方自由人权框架的个人主义基础提出了质疑，西方观念同根植于群体身份认同、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权利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利用人权旗号推进跨国女权主义运动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由此获得特权，国内法律、国际条约及其实施情况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批评人士指出，不应过分强调合法性，³⁹ 也不应强行推广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标准。以权利作为行动的基础，前提条件是国家运行良好，负有责任，公民或团体可以得到法律援助。假如国家法律系统的资金投入不足，或是由于腐败而丧失信誉，这样的国家在执行本

国法律和惩戒侵权者方面不太可能雷厉风行，要其履行国际法律承诺就更加困难了。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各国国内的妇女运动不断努力增强国家改革和执行关系到妇女权利的立法的能力。她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抱负更加远大，并开始以女权主义观点批评当今的“善政”改革进程。

经济公正：新的女权主义活动领域

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影响，跨国妇女运动拿出了自己的对策。1994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发首脑会议上，女权主义者开始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紧缩政策提出批评。在此次首脑会议期间，全球发展选择妇女联盟将妇女协会的区域网络整合为一个妇女核心小组，针对首脑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意义深远的修改建议。这些建议强调如下一些内容：整顿市场，以减少不平等、预防波动和扩大就业；对于投机性的国际金融交易以及扰乱政治和危害环境的其他牟利方式征税；要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机构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人权条约监督机构负责。⁴⁰ 女权主义者此后对于自由贸易的批评还成功地揭示出，自由贸易对减少贫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贸易和投资是跨国妇女运动取得飞速发展的活动领域之一。一些妇女团体的工作重点是创建新的机制，以便同跨国公司就环境和劳动标准问题进行谈判，并监督公司的履约情况。知名度最高的活动是“反全球化”运动。在这项运动当中，妇女团体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任务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批评，并对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审查。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性别和贸易网重点关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美洲

自由贸易区、以及科托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协议。位于欧洲的性别和贸易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正在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的一个常设妇女核心小组，利用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作为切入点，就贸易政策的性别影响进行评估。妇女争取经济公正国际联盟力图通过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对于宏观经济决策施加影响。

在贸易问题上，跨国妇女运动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靠出口带动增长，可能会以牺牲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利益为前提；以及，自由贸易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导致有关各方竞相压低劳动标准（见第三章）。要解决这些问题，取消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巧妙获得的不平等豁免，方法之一是向世界贸易组织施压，利用现有的“特殊和区别待遇规定”，促进贫穷国家减少贫困和实现性别平等，从而支持可持续发展。

正如更为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一样，妇女争取经济公正的运动有时也会遇到矛盾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女性劳动力抢走了发达国家妇女的工作；于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妇女的经济利益往往会产生矛盾冲突，这也正是国际妇女运动出现分歧的真实写照。关于劳动标准和环境标准的运动有可能让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失去工作，或是迫使她们从事政府鞭长莫及的非正式工作。人们一方面担心来势汹汹的贸易型增长可能会危害环境，另一方面又担心环境控制措施可能会剥夺贫穷国家出口商品和发展工业的能力，而富裕国家早已经历过了这一阶段。这些经济利益冲突使得结盟之路困难重重。争取经济公正的跨国妇女团体仍在讨论是否应制订共同的纲领和评判标准，是否应该采取统一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成员。

注释

- 1 Weldon, 2002:97。
- 2 Randall, 1987。
- 3 Molyneux, 2001:3。
- 4 Beckwith, 2004:4。
- 5 Beckwith, 2001:372; Weldon, 2004:3。
- 6 Baldez, 2002:14。
- 7 Molyneux, 2001:145。
- 8 Molyneux, 2001: 146。
- 9 Molyneux, 2001:146–52。
- 10 Huntington, 1991。
- 11 Goven, 1993, 转引自 Fodor, E., 2004a。
- 12 Einhorn, 1993。
- 13 Adamik, 1993; Einhorn, 1993。
- 14 Fodor, 2004:14; referring to Graf, 2003。
- 15 Brand, 1998; Salame, 1994; Lazreg, 2004:6。
- 16 Lazreg, 2004。
- 17 Dobrowsky and Hart, 2003。
- 18 Tripp, 2000:195。
- 19 Mikell, 2003:14。
- 20 Jaffrelot, 1996。
- 21 Menon, 2000; Basu, 2004。
- 22 Basu, 1995。
- 23 Bouvier, 2004:19。
- 24 Paidar, 2002。
- 25 Lazreg, 2004:27。
- 26 Rupp, 1997; Boulding, 1993。
- 27 Petchesky, 2003。
- 28 Said and Desai, 2003。

- 29 Silliman, 1999:152, 转引自 Petchesky, 2000:28。
- 30 Sen, 2004:4。
- 31 Ackerly and D'Costa, 2004:3。
- 3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4条。
- 33 Spees, 2003: 1。
- 34 Prakash, 2002: 4115。
- 35 Doezeema, 2004:chapter 1。
- 36 Doezeema, 2004。
- 37 Sen, 2003:140。
- 38 Ackerly and D'Costa, 2004:15-18。
- 39 Sen, 2003:145。
- 40 Petchesky, 2000:28。